

苏轼石鼓文研究考

王仁海

内容提要：对于石鼓文的研究，两宋时期欧阳修、赵明诚、薛尚功等多从石鼓文的成文时代、作者、序次及刊刻诗义等方面进行考证研究，而苏轼从文学及文字角度进行研究，并“首钩”石鼓文及有音释著述，惜因史料的缺失而未引起世人的重视或有存疑。本文试从明代引用刊本、清代刻石及雕版印刷术的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梳理论证，并将苏轼的石鼓文研究置于宋代金石学研究时代大背景下加以观照，通过翔实的资料梳理和理性分析，进一步证实苏轼“首钩”石鼓文及音释著述的存在并剖析其影响和意义，以期突破世人对苏轼石鼓文研究的片面认识，分析苏东坡本的学术价值所在，以助推两宋金石学和石鼓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苏轼 石鼓文 首钩本 学术价值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其“铭刻于鼓形石体上的‘史籀之迹’和四言体叙事诗，史称‘刻石之祖’”^[1]。共有十鼓，每鼓刻有四言诗一篇，现在看来原文应为七百余字。自七世纪初在陕西凤翔出土以来，由于其文字书写精深、刊刻技术高妙，深受世人的赞誉和金石考古学家的青睐，尤其是随着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两宋对其深入研究进入了一个关键时代，亦成为后世对石鼓文研究需要追溯的重要起点。欧阳修、赵明诚等大多从石鼓文的成文时代、作者、文字内容及诗义等方面进行考证，然苏轼从文学及文字角度来研究石鼓文及音释则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惜其著述未有直接传世而未引起重视或有存疑。笔者试从明引用刊本、清刻石及雕版印刷术等方面进行剖析论述——苏轼对石鼓文研究及相关问题考论。

弁言：两宋时期石鼓文的迁徙概说

石鼓文于唐初发现后就引起了世人注目，其中杜甫、韦应物、韩愈等纷纷写诗作赋、歌咏赞叹。元和十三年（818），郑余庆迁置石鼓文于雍城孔夫子庙。五代十国时期，因战乱，石鼓文先后散失于民间。两宋时期，其命运亦多舛，放置地址多变，基本可以梳理为几个阶段：

北宋天圣四年（1026），司马池（980—1041）提拔为留守司（治所在洛阳）通判，后升任凤翔知府。其人不仅政绩卓著，亦喜好金石研究。就任知府后，细心查访石鼓下落，终于找回九鼓，用车运回凤翔并安置于府门门庇下，“外以木椽护之”。仁宗皇祐四年（1052），向传师四处搜

[1] 仲威：《〈石鼓文〉善本举要》，《中国书法》2019年第2期（总348期），第4页。

访，终于找回缺失的一鼓“作原鼓”，然上端已剝成石臼之形，被凿成了春臼使用，实如宋代诗人梅圣俞所言：“传至我期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近人遇见安碓床，亡鼓作白剝中央。心喜遗篆犹在旁，以白易白庸何伤。”^[1]至此，十鼓同置于门庑之下。

宋大观二年（1108），喜爱金石书画的宋徽宗搜集天下奇珍，将石鼓由凤翔调运至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时蔡京筹建辟雍（即太学），将石鼓置于讲堂。宣和元年（1119），徽宗命人将石鼓请驻皇宫内府，置于保和殿稽古阁内，并令人用泥金填涂文字，不让任何人再进行摹拓，并设置围栏加以保护。

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入侵中原，攻破宋都汴京，将石鼓及保和殿内的金银财宝和文物掳掠一空，金人北渡黄河运往燕京（今北京），将涂金剔出后又把石鼓抛于废墟中。元代初年，石鼓才又重新找回。

至此可以梳理出石鼓文在两宋时期的存放地点如下：

顺序	时间	存放地点	备注
1	北宋天圣四年（1026）至 皇祐三年（1051）	凤翔府门庑下	存九鼓，作原鼓失
2	北宋皇祐四年（1052）至 大观元年（1107）	凤翔府门庑下	十鼓全，作原鼓已残
3	北宋大观二年（1108）至 宣和元年（1119）	东京汴梁（开封） 置于太学	十鼓全
4	北宋宣和元年（1119）至 靖康元年（1126）	东京汴梁（开封） 保和殿稽古阁	十鼓全，已泥金，不能传拓
5	北宋靖康元年（1126）至 南宋端平元年（1234）	金都燕京（北京） 枢密院内	十鼓全，泥金被刮
6	南宋端平元年（1234）至南宋末	废墟中	

一、苏轼初观石鼓文

从上述石鼓文迁徙概说中可知，石鼓文于皇祐四年（1052）至大观元年（1107）存放于凤翔府门庑下，而嘉祐六年（1061）时苏轼（1037—1101）授大理评事，并于当年“十二月十四日，到凤翔府签判任”^[2]。这是苏轼“初从政”，年仅二十六岁，《宋史》对其论曰：“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犖，文章之雄隼，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3]然其一生“又以翰墨妙天下，少时规模徐浩”^[4]。而唐代徐浩甚注重古文字研究，其《古迹记》载：“自伏羲画八卦，史籀造文，李斯作篆书，程邈起隶法，王次仲为八分体，汉章帝始为章草……史籀石鼓文。”^[5]而对于

[1] 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705页。

[2]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7页。

[3] （宋）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818页。

[4] 张金梁著：《〈书史会要〉校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5] （元）吾丘衍：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周秦刻石释音》，第10页。

唐初即已发现的石鼓文，徐浩曾做过深入研究并有著述。受其影响，苏轼自然亦会“规模徐浩”并努力搜寻“石鼓拓迹”，进行描摹学习，而此段时间石鼓文正好在凤翔府。到任后，爱好金石书画的苏轼即欣往：“至孔子庙，观石鼓；过府厅，读诅楚文；游开元寺，观王维、吴道子画；游天柱寺，观杨惠之塑维摩像；泛东湖；登真兴寺阁；游李氏园，吊秦穆公墓：汇为《凤翔八观》诗。尝钩《石鼓文》。”^[1]对石鼓文仰慕已久的苏轼，看到石鼓文实物的那一刻心情激动，如其诗所说“旧闻石鼓今见之”。这也说明苏轼乃初见石鼓文实物，观后兴作“凤翔八观”之一《石鼓歌》。诗文如下：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唯鲔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上追轩颡相唯诺，下揖冰斯同彘彘。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
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耇。东征徐虏阕虓虎，北伐犬戎随指嗾。
象胥杂沓贡狼鹿，方召联翩赐圭卣。遂因鼓鞞思将帅，岂为考击烦矐瞍。
何人作颂比崧高，万古斯文齐岵嶬。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
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文字记谁某。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
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
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
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随击掬。传闻九鼎沦泗上，欲使万夫沉水取。
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工令鬼守。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2]

据史料载，苏轼为官凤翔时间为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至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在凤翔三年任期内，石鼓文始终在凤翔府学门庑下，处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苏轼可随时墨拓和观瞻石鼓，并“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受其诗文影响，其弟苏辙（1039—1112）亦钟爱石鼓文并和诗《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一首，其诗赞曰：“请看石鼓非徒然，长笑太山刻秦语。”^[3]

从时间上来看，苏轼凤翔初任时为嘉祐六年（1061），两年后的嘉祐八年（1063）欧阳修成书《集古录》，其载石鼓文“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识者过半”。这也是苏轼所见石鼓文实物的现状，如此才合乎历史现实，即苏轼凤翔任期所见石鼓文应为“四百六十五字”左右本。

[1]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第99页。

[2]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7页。

[3] 杨宗兵：《石鼓文新鉴》，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5年版，第126页。

二、苏轼“首钩”《石鼓文本》考

明代李日华著《六砚斋笔记》卷三载曰：“东坡首钩《石鼓文》一本，篆籀特全，音释具备，远胜潘迪、薛尚功、郑樵所录。”^[1]从笔记中来看，东坡“首钩”的《石鼓文》比潘迪等人的字数要多，然据清代沈梧《石鼓文定本》记载：“（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录451字，……（明）潘迪（《石鼓文音训》）所见386字。”^[2]而宋代郑樵在《石鼓文音序》中称所见石鼓文现状为：“樵今所得除漫灭之外，字字可晓，但其文不脩，故有得而成辞者，有不得而成辞者焉。”^[3]然其未标注石鼓之字数，按此来推算李日华所注的东坡首钩《石鼓文》字数要多于451字，具体苏轼所摹本多少字未详，然看其校注“特全”二字应为石鼓文的最多字本或较全字本。

对于石鼓文的原有字数，宋淳熙年间杨文曷所著《周秦刻石释音》有大概描述，原著虽已佚然幸被元代吾丘衍收入同名著述，文中记载石鼓文原石为文之行数与字数，虽未注明原文，但却提供了与石鼓文原石、诸多传本互勘的依据，从推理来看，原文应为七百余字。如此推理，苏东坡本所存字数应在451至700（左右）之间才符合李日华所述。

（一）从周鼎藏本与陶滋《石鼓文正误》看苏本

20世纪80年代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墨拓本《石鼓文》，是依民国初年周鼎所藏何绍基（1799—1873）与杨墨林（1807—1856）合钩宋拓本出版，民国十年辛酉（1921）秋八月周鼎跋注该拓本：“横幅字较潘氏本尤多，钩刻极精，惜拓工欠佳，神采稍逊。”^[4]关于拓本的字数，其注：“拓本计四百二十二字，又重文三十九字。”^[5]然经笔者核实，该拓本应为423字，且在拓本的末页左下角“是”字旁也有原毛笔标注数字“423”^[6]字样，故跋语中实为周鼎笔误，应为“计423字”，加上重文39字，共计存字462字。该拓本可贵之处在于：“附何道州书猎碣亭三字并题跋。”^[7]在拓本的每一页上，何绍基又依明代陶滋（字时雨，绛州人）所刻著的《石鼓文正误》，对十鼓一一对应加以题注，对《石鼓文正误》的刻本周鼎赞曰：“此本乃陶公摹之苏东坡本字，有六百一十一字，重文四十有六，实为世所罕见之奇珍。”^[8]从此注可看出苏东坡存石鼓文本应为657字，而何绍基的题跋就是依“苏东坡本”进行了补充和题跋。今将十鼓题跋内容摘录如下：

《鼓一》：“存六十三字，又重文八字，较原文短三字，又重文二字，计十九句。”^[9]（图1）

[1]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第99页。

[2] 杨宗兵：《石鼓文新鉴》，第10页。

[3] （元）吾丘衍：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周秦刻石释音》，第16页。

[4] 周鼎藏本《石鼓文》，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版，第33页。

[5]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32页。

[6]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30页。

[7]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32页。

[8]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33页。

[9]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3页。



图1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一



图2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二



图3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三



图4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四



图5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五



图6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六



图7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七



图8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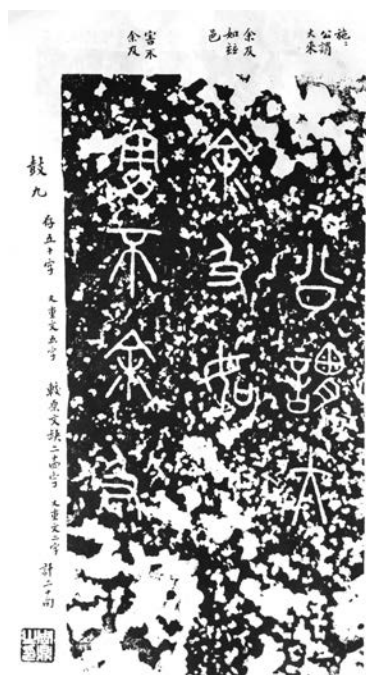


图9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九



图10 周鼎藏本《石鼓文》
题跋之十

《鼓二》：“存六十一字，又重文七，完全无缺，计十七句。”^[1]（图2）

《鼓三》：“存六十二字，又重文五，较原文缺七字，计十八句。”^[2]（图3）

《鼓四》：“存五十字，又重文二，较原文缺十九字，重文一，计十八句。”^[3]（图4）

《鼓五》：“存四十二字，又重文四字，较原文缺二十四字，计十六句。”^[4]（图5）

《鼓六》：“存四十一字，又重文三字，较原文缺十一字，计十二句。此鼓丁五季之乱散逸民间，凿为春臼，宋皇祐四年向传师傅访获之。”^[5]（图6）

《鼓七》：“存十三字，又重文一字，较原文缺四十六字，又重文二字，计十五句。”^[6]（图7）

《鼓八》：“此鼓文字磨灭大半，按苏东坡摹本仅存二十三字，又重文四字，现存十字，又重文三字。”^[7]（图8）

《鼓九》：“存五十字，又重文五字，较原文缺二十四字，又重文二字，计二十句。”^[8]（图9）

《鼓十》：“存二十九字，又重文一字，较原文缺四十三字，计十八句。”^[9]（图10）

从以上题跋内容可以看出，周鼎所藏“杨、何合钩宋拓本”石鼓文剪贴本，为清代何绍基依《石鼓文正误》中“苏东坡本字”与拓片进行了一一对照，并对每个字的释文进行了研究，包括题跋参考的内容都基本一致。如何绍基题于《鼓六》后的内容除字数表述外，与《石鼓文正误》著《其六》“此鼓丁五季之乱散逸民间，凿为春臼，宋皇祐四年向传师傅访获之”^[10]内容完全一样，又如明代陶滋《石鼓文正误》中《鼓八》（图11—12）可见“苏东坡摹本仅存二十三字，又重文四字”共计二十七字，图文与跋相合，其余鼓跋也基本一致。如此看来，何绍基不仅认可“苏东坡本”石鼓文计657字本，而且是在苏本的基础上再深入研究而进行的题跋。而陶滋所著苏东坡本来源于哪里呢？其在著述序中有注：“东坡苏子石鼓文摹本也，刻之者为维扬（今江苏扬州）欧氏本源，欧得之于甬东（今浙江舟山）杨氏准，不知杨得之何人，滋幸天之未丧此文也。”^[11]只可惜此“东坡苏子石鼓文摹本”“薛尚功辈为音释时不获见此”^[12]。故薛著述中所载字数不及苏本。

（二）从左氏耀州摹刻本与杨慎《石鼓文音释》看苏本

近年在陕西耀州药王山博物馆发现《陈仓石鼓》的摹刻本，刻石4块，分为序、文、音释、歌

[1]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6页。

[2]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9页。

[3]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12页。

[4]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15页。

[5]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18页。

[6]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21页。

[7]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23页。

[8]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27页。

[9] 周鼎藏本《石鼓文》，第30页。

[10]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

[11]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253页。

[12]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253页。



图11 (明)陶滋《石鼓文正误》
之《辛鼓》一



图11 (明)陶滋《石鼓文正误》
之《辛鼓》二

颂以及清代左重耀集柳公权书法所撰写的《刻石鼓文铭》五部分。第一块为清顺治十六年（1659）时任耀州知州唐翰辅撰写的《重刻石鼓文序》和《石鼓文》甲、乙、丙、丁四鼓（图13）；第二块为戊、庚、辛、壬、癸六鼓（图14）；第三块为《石鼓文》音释和历代文人的咏诗，有韦应物、韩愈等人诗歌（图15）；第四块为苏轼的《后石鼓歌》、耀州学政金明刘汉儒颂、摹夫子题季子墓十字碑、刻石鼓文铭等（图16）。第一、三、四石竖高80厘米，横宽145厘米；第二石竖高68厘米，横宽172厘米。各石厚为18厘米，石料为原磬玉。经查，该刻石清代乾隆《续耀州志》有载：“岐阳石鼓文史籀大篆”，州守唐汉（翰）辅偶得左佩玆家藏全文，今佩玆子重耀拓勾镌石于文



图13 (清)左氏耀州摹刻《陈仓石鼓》碑刻之一



图14 (清)左氏耀州摹刻《陈仓石鼓》碑刻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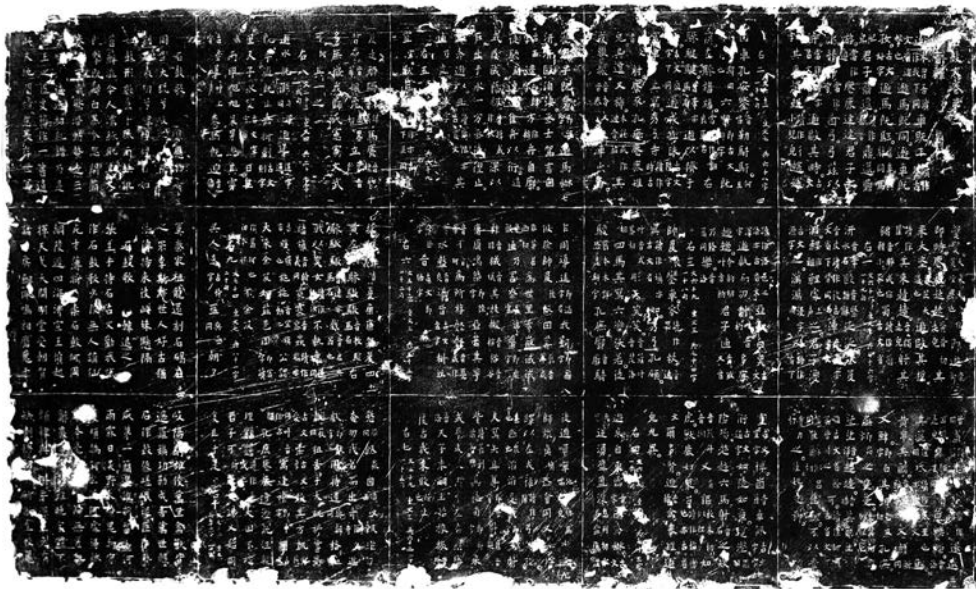


图15 (清)左氏耀州摹刻《陈仓石鼓》碑刻之三



图16 (清)左氏耀州摹刻《陈仓石鼓》碑刻之四

庙门侧。”^[1]

从《序》文中可知石鼓文石刻原为明崇年间左佩玕所藏石鼓文拓本，“正德间成都太史杨慎得之于李文正（即李东阳）先生，先生得之于苏文忠公者。予览之奚啻拱璧。”^[2]那耀州刻石是来源于杨慎，而杨慎又来源于哪里呢？杨慎在其著述《石鼓文音释》（后文简称《音释》）中注曰：“（杨）慎昔受业于李文正（即李东阳）先生，暇日语慎曰：‘尔为石鼓文矣乎？’慎则举潘、薛、郑三家者对，先生曰：‘否，我犹及见东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释兼具，诸家斯下矣。’”^[3]可见杨慎得之于李东阳本，且“音释兼具”。故左氏耀州摹刻本即为杨慎藏李东阳“东坡之本”。

杨慎《石鼓文音释》卷三对十鼓文字数分述如下：

《右一（鼓）》：“文六十六，重文十，共七十六字，一十九句。”^[4]

《右二（鼓）》：“文六十一，重文七，共六十八字，一十七句。”^[5]

《右三（鼓）》：“文六十九，重文五，共七十四字，一十八句。”^[6]

《右四（鼓）》：“文六十九，重文三，共七十二字，一十八句。”^[7]

《右五（鼓）》：“文六十六，重文三，共六十九字，一十六句。”^[8]

《右六（鼓）》：“文五十二，重文三，共五十五字，一十二句。”^[9]

《右七（鼓）》：“文五十九，重文三，共六十二字，一十五句。”^[10]

《右八（鼓）》：“文二十三，重文四，共二十七字，不成句。”^[11]

《右九（鼓）》：“文七十四，重文七，共八十一字，二十句。”^[12]

《右十（鼓）》：“文七十二，重文一，共七十三字，一十八句。”^[13]

而从耀州刻石实物来看，其《石鼓文》内容和释文皆与《音释》同，包括十鼓文字的标序和排版形式，释文中个别字有误，只是刻工欠佳所致，如第一鼓《甲鼓》的开始部分中刻石（图17）与《音释》（图18）是完全一致的，释文部分中刻石（图19）与《音释》（图20）内容也是一致的，只是刻石时根据碑刻需要调整了位置。通过现存碑刻实物对比可以看出，耀州刻石为来源于杨慎的李东阳“东坡之本”，与杨慎所藏为同一“本”源。

综上所述，耀州《岐阳石鼓文史籀大篆》所刻石鼓文及释文来源于杨慎《石鼓文音释》本，乃

[1] 王建域、王福民、董秉坤点校：《明清耀州志合集》，铜川市耀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2018年版，第235页。

[2] 尹博灵：《石鼓文鉴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3]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262页。

[4]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1页。

[5]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2页。

[6]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3页。

[7]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4页。

[8]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4页。

[9]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5页。

[10]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6页。

[11]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6页。

[12]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7页。

[13]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47页。



图17 (清)左氏耀州摹刻《陈仓石鼓》碑刻之《甲鼓》(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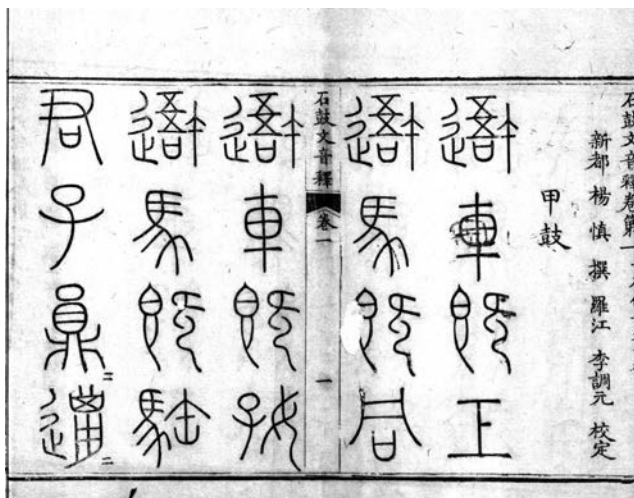


图18 (明)杨慎《石鼓文音释》之《甲鼓》(局部)



图19 (清)左氏耀州摹刻《陈仓石鼓》碑刻之释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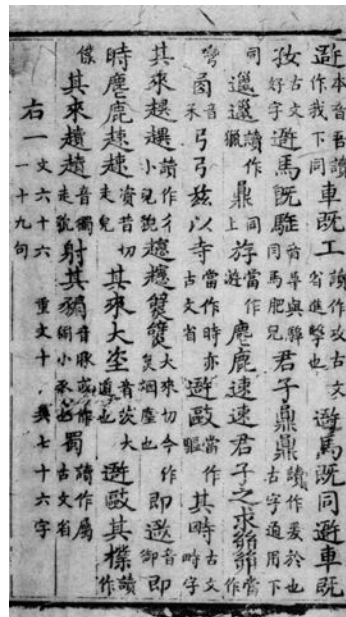


图20 (明)杨慎《石鼓文音释》之释文(局部)

李文正先生所得“苏文忠公”本，存字657字。

另，明代李中馥所撰《石鼓文考》一卷中亦有略注，贵池（今安徽池州）刘廷璠作序曰：“石鼓诗六百五十七言，苏文忠有手勒具其篆额，李文正有章句载其本辞。……僥更求苏文忠李文正善本，使六百五十七言家喻而户诵焉。则薄伐之勋方召之烈至今存也。”^[1]可见明代尚无刊刻于石。

从以上论述可知，清代何绍基石鼓文题跋参考资料、两种明刊本和清代耀州刻石皆来源于苏轼“钩摹本”的刊刻本，字数为657字。

[1]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353—357页。

(三) 苏轼石鼓文本与宋拓(摹)本字数比较

笔者对苏轼石鼓文“首钩”本与存世及有关记载的宋拓本情况进行了逐一梳理和研究,附石鼓文宋拓(摹)本所存字数目一览表如下:

存字数目	著录书籍及拓本	备注
657	(明)《六砚斋笔记》卷三注东坡首钩本	现存刻石为: (清)《岐阳石鼓文史籀大篆》 耀州刻石存字657字 苏东坡本疑为据唐拓本字数钩摹 (笔者注)
	(明)陶滋《石鼓文正误》注苏东坡本	
	(明)杨慎《石鼓文音释》注东坡之本	
	(明)李中馥《石鼓文考》序注苏文忠手勒具其篆额	
497	(宋)孙巨源于佛龕中得唐人拓本(郭沫若存疑)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有注。或以作原石形字数证之云唐拓者不确
462	(明)范钦天一阁所藏北宋拓本	后世摹刻多据此本
451	(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缩刻石鼓文	实为448字
465	(宋)欧阳修《集古录》所记	跋曰: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
474	(宋)胡世将《资古绍志录》所记	(明)吾丘衍《周秦刻石释音》有载
450	(宋)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石鼓文》	宋淳化年间携李沈揆摹本缩小石鼓文
417	(宋)赵夔所见拓本	见《东坡诗注》
480	(明)“十鼓斋”所藏北宋拓本《先锋本》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491	(明)“十鼓斋”所藏北宋拓本《后劲本》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501	(明)“十鼓斋”所藏北宋拓本《中权本》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
460	(宋)梅圣俞《雷逸老人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	梅圣俞诗句“四百六十飞凤凰”
494	(宋)薛季宣《浪语集·岐阳石鼓记》	
441	(明)卢山陈氏所摹刻的宋《甲秀堂法帖·周石鼓文谱》所存	
422	(明)都穆《金薤篇》记所见宋拓	任熹《石鼓文概述》,《考古》总第五期
不详	(宋)王厚之《复斋碑录》拓本	王:得之上庠,手自装治成帙
不详	(宋)洪庆善所遗石鼓墨本	程大昌《雍录》云:郑昂得洪庆善所遗墨本
410	(民国)周鼎藏宋拓剪裱本	周鼎于1911年冬购,原桂坡老人藏宋拓本
462	(民国)周鼎藏杨墨林、何道州合钩宋拓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出版
477	(明)赵古则藏宋代本	(明)都穆《金薤琳琅》云:石鼓文宋代拓本,洪武中藏于余姚儒者赵古则
434	(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云据北宋拓本	任熹《石鼓文概述》,《考古》总第五期
无拓本	南宋拓本	无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明“十鼓斋”所藏北宋拓本《中权本》为501字（不计重文，全字465字、半字30字、合文5、赘文1），经比对实存全字465字，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记载基本吻合：“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1]欧阳修所言四百六十五字是不计重文、合文、半字、赘文的。又梅圣俞《雷逸老人以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诗亦云：“四百六十飞凤凰。”如此看来，欧阳修（1007—1072）时期所拓石鼓文的字数当在465字左右较为可信，而苏轼“首钩”本657字，疑为在唐拓本基础上，又参照实物石鼓465字本考辨时并依诗词之韵“强寻偏旁推点画”而推敲残字进行完善而成“首钩摹本”，亦是今存世最多字“石鼓文”本。

（四）从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史看苏轼“首钩”石鼓文及音释著述

从上述的明刻本、清刻石拓片及相关著述中可以看出，苏轼对石鼓文的研究，既有“首钩本”又有音释著述，笔者从中国雕版印刷术发展史的角度加以分析首本存在的现实性。

宋人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谈道：“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五代）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2]从这段记述来看，与苏轼为同龄人的沈括，生活在北宋神宗年间，他很容易看到大量制作于唐代乃至唐代以前的书籍，然唐代虽然已经有印本行世，但范围和数量极少，可以说：“宋人所见李唐一朝及其以前的书籍，基本上还都是手书的写本。”^[3]自宋代起方始广泛应用雕版印刷术。又如赵明诚《金石录后序》记述，李清照南渡之时，“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十五车”^[4]。而其中的“书之重印本者”与“书之监本者”，显然是宋时的印本，故李清照在后序中记述其留存行篋未丢弃的唐人著述，若李白、杜甫、韩愈及柳宗元诸名家的集子，皆只是写本，决然没有提及“唐代的刻本”^[5]。宋末元初的罗璧（1244—1309）在《识遗》中述曰：“唐末犹未有模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粘之（犹今佛老经），其后稍作册子。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6]罗璧不仅谈到书籍文字内容的制作方式为“模印”（雕版印刷）抑或“传写”（手书），而且还谈到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当是其亲眼所见。而近代敦煌石窟出土的唐人实用典籍，也绝大多数为手写成篇而罕见雕版刊印本，可见唐代时雕版印刷实为“罕见”，而至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始“盛行”，《宣和博古图录》《续考古图》等图文结合的金石著述开始刊刻传承。

如上所述，唐代人韩愈、杜甫等也仅有《石鼓歌》等感性认识的诗词，包括有关文献如李贤《石鼓铭文重说》，虞世南、徐浩、韦续、张怀瓘、宝泉、宝蒙等数人皆用同一名字《石鼓散论》

[1] （宋）欧阳修原著，邓宝剑、王怡琳注释：《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2] （宋）沈括：《梦溪笔谈》，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15a页。

[3] 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页。

[4] （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561页。

[5] （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第561—563页。

[6] （宋）罗璧：《识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成书得书难”条，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b页。

述之，而未见钩摹（图形）、音释（文字）等研究性著述，主要是当时“雕版技术”未有盛行。至宋代，苏轼既见到了石鼓文实物，又能见到唐代的拓本，还有了雕版印刷技术的盛行，故而能使钩摹图形及文字成著述刊行成为可能。而杨慎所参的苏东坡本，在李东阳《石鼓歌》中有述“家藏旧本出梨枣，楮墨轻虚不盈握”，显然其东坡“旧本”为家藏梨枣木刻本，而陶滋在《石鼓文正误》序中亦有专述：“一日过僚友国博陆君俊卿家，见几上有旧书一册，取而阅之，乃东坡苏子石鼓文摹本也，刻之者为维扬欧氏。”^[1]此处明确表明“旧书一册”为“刻”本。回首再来理解李日华所述“东坡首钩《石鼓文》一本，篆籀特全，音释具备”，就会令人豁然开朗。又《辞海》对“首”字有释为“首先、第一”的意思，那么对苏轼“首钩”《石鼓文》，可理解为自唐宋以来第一位对《石鼓文》进行钩摹的人，这样“首钩”才合乎历史记载所述，并且苏轼据其文学修养和参照所见当时的石鼓文残字、半字等加以补全，如高明先生所言：“对那些已被风化的残词，依据上下词义，推测已被侵蚀掉的坏字，并一一添补，以求通读十首鼓诗。”^[2]如此推理，苏轼当有石鼓文钩摹本及音释一书的著述是在情理之中的，既合乎雕版印刷史的发展规律，又合乎苏轼本人对石鼓文研究的学术能力，更符合史料所载，惜刊刻本未有留世，上述陶滋、杨慎的著述也是参阅了苏东坡本而有的金石著述。

三、苏轼对石鼓文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影响

（一）对秦篆的研究与实践

苏轼从师学徐浩起，即钟爱于石鼓文的学习和研究，“首钩”石鼓文全本并有音释，之后每到一处有古文刻石必认真学习和研究，存世有两处篆书书迹。

一处位于山东密州（今山东诸城）。北宋神宗时期的熙宁七年（1074）苏轼知密州，并于“十二月三日，到密州任，上谢表”^[3]。到任后，除政务外，非常重视金石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其中苏轼对秦篆刻石的研究学习在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秦琅邪台刻石》跋记：“右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熙宁中，苏翰林守密，令庐江文勋模拓刻石，即此碑也。”^[4]熙宁九年（1076），苏轼见秦刻石磨泐严重，为留存史迹和便于学习研究，即请“文勋摹秦篆，刻秦始皇颂德刻石，置之超然台上。正月七日，作《刻秦篆记》”^[5]。（图21）明嘉靖《青州府志·诸城》刻本有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邪台，观出日，乐之忘归，徙黔首三万家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岁在壬午，至今熙宁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得旧纸本于民间，

[1] 陈红彦、于春媚辑：《国家图书馆藏石鼓文研究资料汇编》，第253页。

[2] 李铁华：《石鼓新响》，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序第1页。

[3]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第302页。

[4] （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第242页。

[5] 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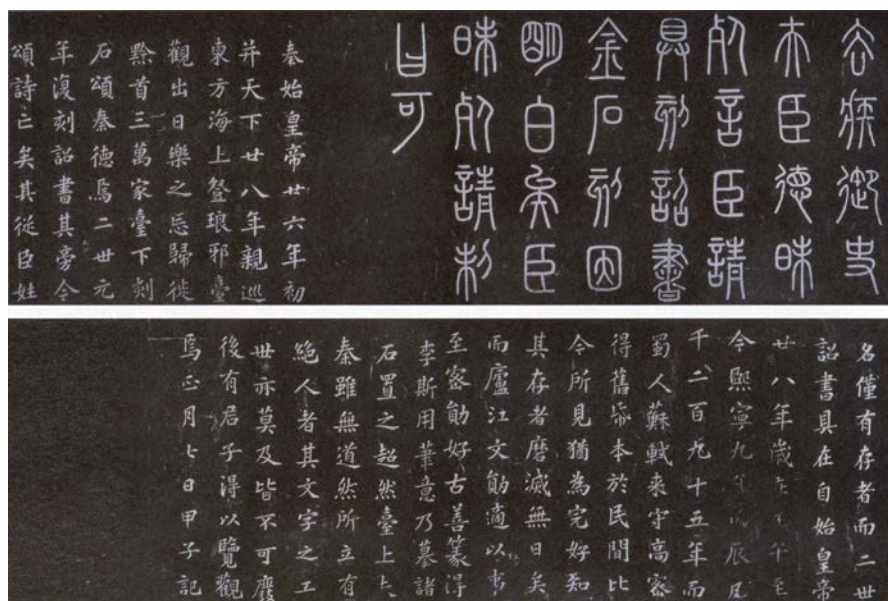


图21 琅邪台刻石并苏轼题跋

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矣。而庐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正月七日甲子记。”^[1]

苏轼刻石至明代已佚，明代都穆《金薤琳琅》云及“文勋摹刻既亡”^[2]。亡佚具体时间，已不可详考。幸至清代道光五年（1825）由当任知县方观国重刻：“临苏轼旧拓片刻石于超然台上苏公祠壁。”^[3]此刻石1962年秋出土于超然台下的城濠中，石高36.5厘米，宽157厘米，厚15厘米，其跋文载：“此秦二世诏书也，旧刻琅邪台上年久石裂字泯，几不可考。宋熙宁九年苏文忠公任密州，曾得旧拓于民间，遂令庐江文勋摹置超然台上存古迹也。道光五年予来令东武，考其石已无存，因思古人名迹，虽真本已失，犹以存之俾流风余韵不致遂尔歇绝。予不敏，无论篆书万不及李斯，即校之文忠公好古之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爰临此七十九字勒于祠壁。贵池方观国。”从跋文可知，苏轼所命刻秦刻石至清代重刻于超然台上，今刻石存藏于诸城博物馆。

另一处位于滕县（今山东滕州）。熙宁九年岁末，苏轼知密州任满，改调河中府，后又改调徐州，至熙宁十年四月到徐州任上，时其好友范纯粹为滕州（时徐州所辖）任上，《文集》卷十一载：“（十月）二十二日，为滕令范纯粹作《滕县公堂记》。纯粹替去，交代新任王安上立石。”^[4]此刻石现存滕州市木石镇墨子故里博物馆。（图22）该碑刻“高190厘米，宽80厘米，厚22厘米”^[5]。内容为赞范纯粹修县公署一事。其碑额“滕县公堂记”五字篆书是苏轼存世少有之字，受石鼓文大篆影响，金石气十足，正如其论书：“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

[1] 张清吉校编：《诸城历代方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6页。

[2] 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49页。

[3] 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第50页。

[4] 孔凡礼撰：《苏轼年谱》，第399页。

[5] 王仁海：《苏轼山东留存书迹考察与研究》，《书法研究》2019年第4期，第130页。

述,后来的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李中馥《石鼓文考》、冯惟讷(1512—1572)《古诗记》等都有相关论述和记载,清代及近代也多有论述和参考,虽然后人包括近代的郭沫若等学者有不同观点并有存疑,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研究价值,结合现存有关宋拓本进行深入的研究,依然意义深远。

宋代金石学热潮背景下的石鼓文研究,苏轼是参与较早的北宋士大夫之一。为便于理解两宋金石环境,笔者整理出苏轼与两宋有关石鼓文研究著述及相关文献一览表如下,以供参考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	著述或文献名称	备注
苏轼	《苏轼首钩石鼓文及音释》	已佚,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有载,杨慎《石鼓文音释》、陶澐《石鼓文正误》有引用参考
杨文冕	《周秦刻石释音》	一卷(已佚),元代吾丘衍《周秦刻石释音》序
薛尚功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刻本《岐阳石鼓》	有刻本《岐阳石鼓》并释文注
郑樵	《石鼓文考》	三卷(已佚),《宋史·艺文志》小学类作一卷,《直斋书录解題》卷三,章樵《古文苑》注引
陈思	《宝刻丛编》之《石鼓文》	二十卷,其中引《资古绍志录》之“石鼓文”一则
欧阳修	《集古录》之《周石鼓文》	《集古录》、《空山堂全集》说郭本
章樵	《古文苑》之《石鼓文》	《古文苑》卷一序清光绪十四年版
苏轼	《东坡先生集》之《凤翔八观之一》	《东坡先生集》清刊本4函32册
苏辙	《苏辙集》之《和子瞻凤翔八观之一》	《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张耒	《张耒集》之《瓦器易石鼓文歌》	《张耒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董道	《广川书跋》之《石鼓文辨》	《广川书跋》中华书局
释梦英	《石鼓散论》	《四库全书》812卷869页
梅圣俞	《苑陵集》之《赠逸老以石鼓文见遗传》	清宣统二年石印本
蔡襄	《蔡忠惠公集》之《石鼓文跋》	清乾隆年间刊本
朱熹	《诗传遗说》之《石鼓散话》	《四库全书》75卷567页
陆游	《放翁题跋·跋石鼓文辨》	《四库全书》有载
薛季宣	《浪语集·岐阳石鼓记》	《四库全书》
程大昌	《石鼓考》	《雍录·考古篇》、《关中丛书》本第3函
施宿	《石鼓音》	一卷(已佚),《宋史·艺文志》小学类,《古文苑注》引
王厚之	《石鼓音释》	《复斋碑集》见《金石萃编》及《石鼓文训集证·传本目》
王厚之	《石鼓文跋》	见章樵《古文苑》石鼓文后,清光绪有刊本
姚宽	《石鼓散论》	《姚氏残语》说郭本
胡世将	《周宣王石鼓》	《金石萃编》《石鼓文音训集证·传本目》《资古绍志录》

(续表)

作者	著述或文献名称	备注
陈岩肖	《岐阳石鼓文》	《四库全书》1479卷521页《庚溪诗话》
吴曾	《石鼓散论》	《守山阁丛书本》《能改斋漫录》载
翟耆年	《石鼓碑》	《守山阁丛书本》《籀史》载
乐史	《太平寰宇记》之石鼓文	卷三十《凤翔府》下有注
洪适	《岐阳石鼓文》	《盘州文集》卷63
朱长文	《周石鼓文》	《四库全书》812卷869页《墨池编》卷六
赵明诚	《金石录》之《石鼓文跋》	《金石录》卷13跋
郭忠恕	《石鼓释文》	清康熙元年墨妙楼版本
洪迈	《容斋随笔》之《石鼓歌过实》	《容斋随笔》卷四一则
周越	《古今法书苑》之石鼓文	《宋史·艺文志》有载

综上所述,苏轼对石鼓文的研究较为深入,其“‘首钩’石鼓文及音释”著述亦当是唐宋以来第一本关于石鼓文的金石著述,且为字数最多的“钩摹”本,对后世从文学及文字角度来研究石鼓文起到了深远的启迪作用。“篆籀特全”的苏东坡本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研究著述多有引用和参考,今存藏于耀州的清代早期“苏石鼓文”刻石及拓本意义重大,也是存世唯一的石刻实物,对苏本的石鼓文研究就是一个重要佐证,惜郭沫若先生生前未曾目睹过。明末清初的尤侗(1618—1704)有诗云:“石鼓何逢逢,千年不闻响。唯留大史名,斑剥青苔上。读之不能终,望古独遐想。”^[1]尤侗的诗也表达了千百年来石鼓文研究有识之心声,正如民国时期王国维所评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大夫们:“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2]苏轼对石鼓文的研究也仅是其金石、书画、诗词之一:“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3]时至今日,学者们对石鼓文的研究,在参照宋代留存拓本的基础上,也对苏轼“首钩本”及音释多有借鉴和参考,其影响可谓深远。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1] 李铁华:《石鼓新响》,第228页。

[2] 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3] 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第117页。